四专家评述“南方谈话”——

下一个20年 需要继续解放思想

本报记者 龚海

一月的深圳,惠风和畅。莲花山顶上的邓小平雕像对外地游客依然有足够的吸引力,那个疾步向前的形象时刻让人感受到要“敢闯”的精神感召。

邓小平当年是1月19日到的深圳,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彭立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:“过去刚好20年了,我得赶快呼吁深圳方面进行相关的纪念座谈。”彭立勋觉得纪念活动也是找个机会对目前的发展状况进行反思。

20年前,邓小平的“南方谈话”中止了“姓社姓资”的争论,让中国社会进入了不争论的阶段,开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,在发展中解决问题。

“邓小平当年的讲话高屋建瓴,现在也有很多改革措施出台,高度都不如小平当年。”综合开发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冯苏宝告诉本报记者,这种“焦虑的情绪一直在弥漫”,更为遗憾的是,“现在大家普遍缺少思想了,包括知识精英,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。”

“自嘲”背后始终绕不开一个话题:“南方谈话”所带来的改革红利已经吃了20年,中国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?

不管是当年“南方谈话”的见证者,还是致力于现实研究的知识阶层,都对这个问题表示关切。他们中很多人认为,与当年不同,今天的改革面临更复杂的问题。

“没有闯劲儿了,进一步改革就更困难了”

对改革的焦虑让人欲言又止,但焦虑不只是这个时代的症候。“我认同张鸣在《辛亥:摇晃的中国》中说的,中国在推翻满清后走向共和,但带来了一种多动症,改革的多动症,不断地改革、折腾,但却没有高屋建瓴的看法。”冯苏宝说。

不过“南方谈话”不一样,冯苏宝觉得除了领导人的魄力,谈话里头提出的整个社会构架都是高屋建瓴的。“我们研究中国模式,发现邓小平的精髓有两点:其一,他用的是曾被批判过的话,如搞调和论、不坚持原则,而他恰恰是讲调和,这是种折中主义,比如姓“资”姓“社”我不管,只讲发展生产力。其二,他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了,不管政治如何,经济可以单独发展。”

“邓小平看得很清楚,头脑也很灵活。”但让冯苏宝感到焦虑的是,现在谈论问题往往缺乏宏观的高度,“一些问题谈得很专业,完了之后,发现一点意思也没有,有些还没看清楚。”

方向感的缺失让人苦恼,而现实中并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供直接照搬或学习。当年讲摸着石头过河,但现在,吴松营说,“特区的精神是敢‘闯’,没有闯劲儿了,进一步改革就更困难了。”

与邓小平当年的振臂一呼相比,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认为,现在的改革需要的仍然是顶层设计,“真实的问题在于改革的导向问题,改革缺乏共识,也没有形成新的改革共识,而要达到这种共识,取决于改革能不能在实现大多数人利益上有重大突破。”

“南方谈话”所带来的改革红利已经吃了20年,中国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?不管是当年“南方谈话”的见证者,还是致力于现实研究的知识阶层,都对这个问题表示关切。他们中很多人认为,与当年不同,今天的改革面临更复杂的问题。

以深圳为例,冯苏宝说,“深圳改革的辉煌在南巡之前,南巡之后大概又持续了五年,再以后的改革就不再那么大刀阔斧了。”

涉及具体领域的改革常有,但涉及社会构架的清晰的改革思路已很少见。在深圳市政府法制办的一次会议上,就特区立法,冯苏宝尖锐地批评:“现在我们用特区立法这个权,还只是‘小打小闹’,真正的大手笔,伤筋动骨的,比如行政体制改革,这方面基本上没有考虑。”

“现在要更安全地进行改革”

曲建直观的感受是,改革变得平稳了。曲建是研究区域经济的专家,同时也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副院长。

曲建对本报记者说,“20年了,就像盖一座大厦,主体结构已经完工了,现在是内部装修阶段,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一天两三层楼地飞速增长,现在是一点一点地完善。”

他不认为改革陷入了泥淖,“以前是穷,穷则思变,现在人富了,改革的动力就变弱了。”

吴松营说这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在作祟,“他们只想寻找既稳妥又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发展方式,没有冒险的要求了,也就没有探索的动力了。”

这些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在冯苏宝看来却不是大问题,“现在要解决的还是改革的大方向问题,方向确立了,协调这些人的诉求只是个技术问题。”

今日改革的难度自然非当年一穷二白时可比,“今天的深圳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不可同日而语,船大难掉头,现在要更安全地进行改革。”曲建说。

吴松营承认,深圳发展到现在,再有大发展也不容易,“但这时更需要有敢闯的精神,为全国的改革探路,但却没有。”

“我们开放的空间还很大”

开放曾经被当做促进改革的比较稳妥的路径。

按照邓小平的思路,对外开放是为了促进对内的改革。经济的发展迟早会触及社会构架方面的问题,这种倒逼机制曾经不断地推进体制的革新。通过开放,比如学习新加坡、香港等地的做法,中国内地在改革上得到了很多借鉴。

现在,吴松营觉得“已经基本没有开放的问题了,剩下的只是改革的问题”。

但曲建在几年前重新提出“以开放促改革”,“因为单一的改革阻力很大,方向也不明确,怎么能在不清晰中寻找方向、怎么调整利益,仍然需要开放,引入竞争者,把国际上好的管理办法引进来,促进国内的改革。”

尽管现在连内陆城市都高度开放了,但曲建认为开放的路子还有很长一段要走,“许多领域,如垄断行业、金融等,都还没有开放。垄断行业的破除,政府职能的转变,我们开放的空间还很大。”

不过,以开放促改革并非按部就班,迟福林认为,“开放促改革是过去20年发展的基本路径,但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,中国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大经济体,整个制度安排能不能与中国的开放程度相一致是个问题,比如人民币国际化,就需要利率的市场化。相比以开放促进改革,以改革来促进开放更为迫切,有了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经济上更大的开放,中国才能从全球化经济的参与国转变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主导国。”

“深圳要在产业上转型升级”

在经济发展上,冯苏宝主张由现在的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型,这是一个目标。

“开放型经济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,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种逻辑结果。”在冯苏宝看来,开放型经济类似于世界上的自由港制度,在制度安排上实现贸易、金融自由、投资自由、运输自由。

曲建为深圳特区的转型进行了谋划,方向很清晰,“深圳成熟的市场经济至今是内陆城市所羡慕的,下一步它要在产业上实现转型升级,与发达国际经济体同步,在城市功能上向国际化城市看齐,人口管理实现一体化,社会管理实现一元化,一旦完成了这个华丽的转身,它就为内陆城市下一个20年的发展寻找到了途径。”

不过变革依然面临不少困难,迟福林将之称为改革“进入了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攻坚阶段”。

迟福林,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

吴松营,邓小平深圳南巡期间全程记录者之一,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

曲建,综合开发研究院(中国·深圳)副院长

冯苏宝,综合开发研究院(中国·深圳)战略研究中心主任

迟福林:在转型中寻找出路

本报记者 龚海

齐鲁晚报:邓小平“南方谈话”过去20年了,中国经济在此间持续高速发展,如何评价“南方谈话”的意义?

迟福林:“南方谈话”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里程碑式的意义,开启了中国改革的新时代,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思想解放。

当时,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、如何看待市场经济,还存在很多争论,社会上“左”的思潮很盛。“南方谈话”谈到只有继续解放思想,改革才能有出路,这大大坚定了改革的决心和信心。

邓小平说中国只能往前走,不能往后撤,允许先行先试,要大胆。至于改革开放的突破点在哪儿,他提出来了,就是市场经济。我在1991年的时候还发表了有关市场经济的文章,当时有争论,但“南方谈话”之后,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立为中国改革的方向,对此,“南方谈话”起到了历史性作用。

齐鲁晚报:20年过去了,今天的中国是否又到了新一轮改革的节点上?

迟福林:这实际上是一个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的问题。“南方谈话”20年来,我国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,经济持续快速增长。目前,面临的突出问题是:投资消费失衡、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,这比当初的改革更具复杂性,改变这种现状仍需在改革中寻求出路,寻求办法。

过去20年,中国的发展做了两件大事,一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,二是做大了经济总量。但今后20年是如何公平可持续发展的20年,这是后20年的目标,也是现在要思考的问题,我们需要以公平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。

二次转型与改革可以概括为20个字:消费主导,民富优先,绿色增长,市场导向,政府转型。这是小平南巡讲话20年后,中国改革发展所面临的新任务、新战略。

齐鲁晚报:“南方谈话”后,中国的社会发展在经济改革上首先取得了突破,现在再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是否会忽略社会其它方面存在的问题?

迟福林:中国现在仍然是个发展和转型的大国,发展处在关键位置,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符合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。

不过现在需要改革,经济要转型、社会要转型、政府职能也要转型,在转型中寻找出路,只有解决好现在的矛盾才能给发展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。解决好贫富差距,走向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,这会给发展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和动力,这也是经济发展的保障。

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是社会和企业的事情,政府需要以公共服务为中心。因为只有政府确立民富优先的发展思路并转变职能,提供经济型公共服务,这样才能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制度保障,如果不转型,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很难做到。

齐鲁晚报:邓小平的“南方谈话”还能为中国社会今后的发展留下哪些遗产?

迟福林:诸如继续解放思想才有出路,坚定地把改革当成发展的动力,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,尽快创造条件走向共同富裕,把改革创新的任务尽快推上来,这些思想对现今中国的发展仍然有指导意义。

齐鲁晚报:与20年前相比,现在进行改革是不是更难了?

迟福林:现在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于利益关系的协调。小平南巡20年来,做大了经济总量,但贫富差距也被拉大了,改革面临全面的利益关系调整。最突出的问题是既得利益者的形成,既得利益者的形成是阻碍改革的主要因素,他们既不想回到计划经济,也不愿再推进改革。对他们来说,保持现状最好不过。

现在的改革也需要新的方向,比如调整国民收入格局,推进劳资谈判,改革财税体制,首先需要确定改革的大导向。

目前,经济转型、社会转型、贫富差距、利益调整等问题,焦点都集中在政府转型上。在当前矛盾问题特别突出的情况下,必须坚持小平南巡讲话精神,坚定改革决心,形成改革魄力,务实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转型。